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A History of Disputes over
the Nanjing Massacre*

南京事件争论史

——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日〕笠原十九司 / 著 罗萃萃 陈庆发 张连红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A History of Disputes over
the Nanjing Massacre*

南京事件争论史

——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 (日) 笠原十九司著；罗萃萃，陈庆发，张连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2276 - 3

I. ①南… II. ①笠… ②罗… ③陈… ④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 - 研究 IV. ①K26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7756 号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南京事件争论史

——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著 者 / 笠原十九司
译 者 / 罗萃萃 陈庆发 张连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马 爰
责任校对 / 甄 飞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7 字数 / 291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276 - 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0270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事件，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努

力。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于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代友好下去。而对于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

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于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在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的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

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

中文版序言

拙作《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平凡社新书, 2007)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 获此殊荣, 深感欣慰! 本书还编入了几篇笔者在中国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本书的翻译出版,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先生的推荐, 承蒙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策划承办, 对此, 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有, 罗萃萃、陈庆发等老师担任了拙作《南京事件争论史》的翻译工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先生、徐思彦女士和相关人员承担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拙作《南京事件争论史》首先阐明了南京大屠杀(以下简称南京事件)爆发期间, 日本政府和军部指挥层所获得的信息以及对事件的认识是与国民不同的。其次阐明的事实是, 东京审判是依据确凿铁证来判决南京事件是有罪的。然后, 在此基础上, 梳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展开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南京事件争论)”的历史背景和“争论”内容, 并整理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 在学术上“争论”的经纬直至“结束”的全过程。整理归纳结果显示, 那时的“争论”仅停留在“发生过吗”或“没发生过吗”这种层次上。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1984年成立）成员为中心进行的在国内外挖掘、收集南京事件史料与证言的工作进展迅速，编辑翻译出版了9部资料集，还相继出版了记述南京事件原因、经过、结果及其历史影响乃至整个事件全貌的历史书籍。藤原彰的《在南京的日军》（大月书店，1997）和拙作《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从历史学研究角度，整理并阐述了有关南京事件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争论”的“结束”。在学术上，这两部历史著作所记述的南京事件史实和历史全貌是不容否定的。

至此，在日本展开的围绕南京事件是否是史实的争论，在学术上，以否定派、虚构派的失败而告终；对于家永三郎教科书案的判决，也以企图从教科书中抹掉南京大屠杀记述的文部省的败诉而告终；以“冒牌受害者”罪名起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夏淑琴女士的名誉损害案，也以李女士和夏女士的胜诉而结束。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这两个否定派的起诉人，则被判道歉和支付赔偿金。还有，否定派和两军官后人宣称，记者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一书中写了“百人斩竞赛”，这毫无事实根据的内容导致向井、野田两军官后人名誉受损，从而以名誉损害罪将本多胜一告上法庭，结果也以败诉而告终。这样一来，与南京事件相关的案件，均判决否定派败诉。这足以证明南京事件争论在司法界也已结束。

在日本历史学界，南京事件是历史事实已成定论。历史学辞典、百科全书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教科书中，都有关于南京事件的记述。另外，外务省在其网站的主页上，也公开表明了“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解”。日本政府认为，毋庸置疑，日军“进入”南京（1937年）后，存在大量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和掠夺行为，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首的政府，却又公开发表否定南京事件事实的言论。《产经新闻》、《文艺

春秋》、小学馆等保守派媒体，不厌其烦地鼓吹在学术上已被驳倒的否定论的观点。部分学者、文化界人士、教育工作者也公然与此呼应，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捏造的”等否定论论调，不断在政治上蛊惑人心，妄图从“国民的记忆”中抹去南京事件。为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一直未能在日本国民中形成固定的历史共识。

日本否定派的这类行为，在精神上严重伤害了南京事件受害者和受害国的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使其从此不再信任日本并对日本极为反感。另外，在日本，以政治家、大学教授为中心，掀起了非学术性的否定论潮流。保守媒体还不厌其烦地大肆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不少日本国民受其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因此大受其害。

更让全世界惊愕不已的是，就在南京事件发生 70 周年的 2007 年，CS 电台“日本文化频道樱”的社长水岛，竟然作为导演和制片人，制作了认定“屠杀不存在”的电影《南京实情》。而且，还有 100 名自民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大学教授联名支持该影片的制作计划。自民党还在“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协会”（会长中山成彬，原文科相）中，设置了南京事件小委员会（会长户井田とおる），并于 2007 年 6 月 19 日发表了《调查验证的总结》，继续兜售东中野修道等的否定论，还发表“中国主张‘大屠杀’仅是政治宣传”、“已经证明南京大屠杀纯属东京审判虚构”等言论。即使在民主党内，也由鹫尾英一郎等 20 名国会议员作为发起人，成立了议员联盟“民主党检验慰安妇问题与南京事件真相协会”，以此反对“东京审判史观”，对抗“以南京事件为代表的反日宣传电影”；还聘请东中野修道和藤冈信胜等否定派为讲师，从事否定南京事件事实的宣传活动。

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南京事件争论”已结束了。然而，要求尊重这个结果并寻求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断的意见，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反对。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日本国民

一直未能正确认知南京事件史实的原因。

2010年1月31日,《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开发表,报告中没有战后史部分。该项目是安倍晋三首相2006年10月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提议决定的。紧接着,当年11月在河内召开的APEC部长会议期间,麻生太郎外相和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举行会谈,决定了共同研究的实施框架。12月,两国各出10名委员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此开始中日共同研究。

《报告》中的近现代史组的“第二部 战争时期”部分,日方执笔的是“第二章 中日战争——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抗战”,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攻占南京与南京屠杀事件”。该小节用两页篇幅记述了南京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屠杀行为。中方执笔的是“第二章 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全面抗战”,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南京大屠杀”。该小节也用两页篇幅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记述中引用的资料有:事件发生时,身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的受害调查史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长德国人约翰·拉贝,美国记者达迪恩、斯提尔等人的记录。

在《报告》中,日中双方都详细记述了南京事件的历史事实。介绍遇难者人数时所引用的史料,双方是一致的,依据的都是东京军事审判和南京军事审判的判决书。东京军事审判的人数是20万人以上,南京军事审判的人数是30万人以上。对于这一点,日本政府相关人员,务必要有清楚的认识。日本政府已决定“关于中日历史问题,交由专家判断”。现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已有结果报告,即认定了南京事件是历史事实。因此,下一步就是要求日本政治领导人,用行动来表示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即认定南京事件是事实。在政治上结束这场争论,还要反映在政府的历史政策上。

具体来说,第一,为了在日本学校的历史教育中能够如实地进

行关于南京事件的教育，至少不再对教育施压和管制，应改革文科省的教育行政管理。

第二，应坚决采取措施，允许描述南京事件的外国电影如《约翰·拉贝》（德国人佛罗瑞·加仑伯格导演）和《南京！南京！》（中国人陆川导演）等，在日本国内安全上映。因为在日本，由于害怕右翼势力的大肆干扰，一般影院很难放映这些电影，致使这些电影至今还未能在日本上映。

第三，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于1970年12月7日访问华沙之际，在矗立于集中营前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表示谢罪，从而打开了德国与波兰达成历史和解之大门。借鉴此例，日本首相也应该访问南京，前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向遇难者表示哀悼，以此在政治上解决因南京事件为代表的中日间历史认识问题所引起的争端和对立，并开展对话直至达成和解。如果这样做，将很快达到《报告》（《报告》的“序”）的目的，即“缓和因历史问题产生的对立情绪，加强两国交流，加深两国和平友好关系”。

正如拙作“结束语 希望展开真正的学术争论”中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南京事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以显著改善。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2006年，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也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所。这些都使得年轻学者得到很好的培养。另外，以享有“中华民国史研究第一人”声誉的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为主编，还集体编辑、翻译、出版了多达55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我企盼日本史学界也能为年轻学者提供完善的研究南京事件的条件和环境，推动他们与中国的年轻学者进行共同研究，在日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术上展开真正的南京事件争论。

诸位中国读者，通过拙作您将了解这样一段历史：在战后的日本，有一批像我们这样有良知的日本学者、记者、律师、教师和市

民，一直在与南京事件否定派做艰苦的斗争，并在学术上取得了胜利。同时，您一定能够了解日本国民为何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南京事件史实之缘由。如果今后两国人民能够从此围绕南京事件，进行历史性对话，增强相互理解，并以史为鉴，发展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笔者将不胜荣幸。

笠原十九司

2010年6月6日

序 言

世界关注的日本

留学生的震惊

因工作关系，我有很多机会与来自中国、韩国以及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留学生交谈。在他们各自国家的电视、报纸中，有关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事件（简称“南京事件”）否定派的活动，已成为报道热点，经常见诸新闻媒体。为此，大多数留学生认为，主张修正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日本具有影响力。留学生来到日本后，进入东京等地的大书店，迎面看到的都是视南京大屠杀为“谎言”、“虚构”、“幻影”的书籍；一打开电视，看到的民营电视频道的时事论坛节目，充斥耳膜的几乎都是名人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南京大屠杀子虚乌有”、“外国人的政治宣传”等。更有甚者，定期刊登在报纸广告栏和悬挂在电车内广告上的月刊、周刊杂志，其目录无一例外都有谴责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标题，如“美中信息战阴谋”、“反日政治宣传”、“自虐史观”、“左派·马克思主义史观”等。

因此，留学生“确信”：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派，在日本掌控着绝对强势的影响力。而当他们得知以下事实后皆大为震惊。

外务省官方网站有一栏目叫“历史问题问答”。其中“提问

8”问道：日本政府怎样看“南京大屠杀”？网站登载的回应是政府立场：“1. 日本政府认为，不能否认日军进入南京城（1937年）后，有过许多杀害和掠夺非战斗人员的行为。2. 但是，对遇难者具体人数存在许多说法，政府认为：很难认定哪个数据是正确的。3. 日本坦率承认，在过去一个时期，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造成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和痛苦。对此，政府一定铭刻在心，将痛定思痛，时刻反省，并表示最深刻的道歉，决心不再战，走和平国家之路。”

作为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时刻不忘日本的侵略行径，不忘曾致使受害者遭受巨大灾难和痛苦，时刻进行痛切反省和道歉。这段表明日本政府立场的文字已译成英文，通过日本政府的英文网页正式向全世界公布。

还有，留学生与日本学生交谈后即可感受到，日本学生给人的印象与日本出版媒体、报纸、电视不同，大多数日本学生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南京屠杀”、“南京事件”，而且否定该历史事实的学生并不多（不过，日本学生了解的只是历史学专用术语，至于事件详情，则无学生知晓）。这是因为，在日本学生所学过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记载，尽管只有寥寥数行，可还是有的。历史辞书中也有记载。翻开日本人广为使用的语言类词典《广辞苑第四版》（岩波书店），在“南京”项目中，对“南京大屠杀”是这样解释的：“该事件发生在日中战争时期，是南京被占领后的1937年12月前后。当时日军在南京城内和郊外，大肆屠杀众多的中国军队的投降军人、俘虏以及普通市民，并进行了放火、抢劫、强奸等非法活动。”

留学生了解这些情况后都大为震惊，并随之产生疑问：南京大屠杀事件已编入学校历史教材，甚至词典、历史辞书中都有记载，为何在日本社会，在日本国民的头脑中，对这段历史没有认识？为何这段历史没有成为常识，没有成为日本“国民的记忆”？非但如此，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反而能在日本大行其道，广为流传，有着强

势的影响力呢？

每当我参加外国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时，会场上肯定有学者提出同样的疑问。还有，迄今为止，每当外国记者和媒体采访我，总要问：“南京事件这一历史事实，为何一直未能成为日本国民固定的共识呢？其历史和社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日本国民心理或集团心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甚至有位法国记者说：“历史事实非但没在日本国民心中形成固定共识，甚至被歪曲、被抹杀。这样的社会作为民主国家，是不是不成熟呢？如果不是，那国家就危机四伏了。”

本书的主题与目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角度，分析阐明产生这一系列疑问的主要原因，从而让留学生和外国人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为此，本书将结合战后日本社会研究南京事件的状况，围绕该事件进行争论的情况以及日本人认知南京事件的思想变化历程，客观且全面地分析日本人是如何认知战争和历史的。分析中还结合了日本社会、日本政治以及日本社会构造等因素。

本书主题就是副标题所写的，即“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历史事实的？”反言之，“日本人为何没有认清（南京事件的）史实？”

本书的主线是：首先，从南京事件爆发，到战败不久即开庭的东京审判，直至对南京事件证据的查证以至判决有罪。接着以20世纪70年代初展开的南京事件争论为中心，通史性地整理迄今日本人对南京事件的认知历程，并考察每个不同时代认知的特征。因为南京事件是反映日本人战争理念和认知状态的典型事例，因此，将各个时代日本人对战争理念和认知变化过程作为历史背景一并研讨。另外，本书在透析南京事件争论背后政治构造的同时，考察支撑日本长期处于争论状态的因素，并尝试用外国人容易理解的方式

进行阐述。

最后，作为课题，本书将探讨怎样消除中日人民之间因南京大屠杀事件而产生的对立和摩擦；探讨将来怎样进行对话，怎样达到相互理解；探讨如何将日本人的战争理念、战争责任问题，定位为与东亚乃至国际社会和平息息相关的问题，以此来“克服过去”，构筑和展望和平的东亚地区。

关于《南京事件争论史》书名的由来

是否把书名定为《南京事件争论史》？对此我也曾犹豫过。因为，阅读这本书就会明白，围绕南京事件争论的态势，与一般学术争论不同，也与历史学的争论不同。坦率地说，看上去争论双方始终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无法展开建设性的学术讨论。双方之间没有可以相互磨合的讨论接点，一味重复各自的主张。

在日本国内有两个派别，一个是把日中战争看做侵略战争进行批判，一个是视日中战争为“正义战争”给予肯定。而南京事件则是向人们揭示日本人战争理念最关键的典型事件。此外，南京事件是导致日中人民历史认知不同的典型事件，继而引发教科书问题、民族对立问题，最终超越学术领域上升为政治问题。更甚者，因为否定南京事件的右翼政治势力用恐吓、威胁手段压制舆论报道，致使围绕南京事件的争论，扩展到学术范畴以外的领域，这也反映出严酷的日本社会现状。

尽管如此，把书名定为《南京事件争论史》，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争论”、“南京事件争论”的说法，在日本社会已被公众熟知，并作为形象不好的话题常被提及。例如，中山治在《日本人为何具备多重人格》（洋泉社，1999）一书中就写道：“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随军慰安妇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围绕日本近现代史对这些问题的评价，整个日本被分割成了两大派。相互间不厌其烦地诽谤、中伤、捣软肋，犹如在泥浆中混战。且事态还不断扩大，